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社会治理智慧

——安徽桐城弘扬传统美德化解社会矛盾的实践探索

□ 本报记者 王 雪



桐城，地处安徽中部，枕大别之脉，三面环山；濒长江之滨，一面临水。“溪路行将尽，初过北峡关。几行红叶树，无数夕阳山。”清代文人笔下的桐城景致，恰似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晕染出桐城的灵秀雅致。由古至今，此地便以“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的盛景闻名遐迩，贤达之士辈出，文风昌盛、儒林芬芳，熔铸着民族精神与人文风骨。在桐城的西南角落，坐落着一条古雅幽谧的小巷。巷内青瓦覆顶、飞檐斗拱、粉墙环立，黛色晕染岁月痕迹，映现时光静好。它不过百米长、两米宽，巷道两端，石牌坊静静矗立，其中一块之上“礼让”二字清晰可见。这里，便是声名远扬的桐城六尺巷。

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安徽考察期间，专程来到六尺巷。他漫步其间，重温那段张吴礼让的动人典故，并仔细观察了桐城的历史文化展陈。“来这里看一看，很有感触。”参观六尺巷时，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道，“六尺巷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要弘扬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解决好民生问题，化解好社会矛盾，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席话，深刻揭示了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现代社会治理的智慧，指引我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六尺窄巷，何以成为人们心中最“宽”的街巷？新时代新征程，桐城市给出了答案。近年来，桐城市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推行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将六尺巷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文化注入基层治理，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文化滋养 培育和谐“新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社会治理是在一定文化基础上展开的，不是空中楼阁，不能抛开传统凭空进行。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土地上，推动社会治理不断向上向善，就一定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和智慧。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在历史长河的千淘万漉中，桐城的六尺巷，于时光深处散发着独特的人文光辉和善治智慧。脍炙人口的诗句“让他三尺又何妨”背后，六尺巷的故事生动展现了古人以礼相待、克己让人的处世智慧与高尚情操。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耘说：“它不仅是邻里间谦和礼让、和睦相处的佳话，更是彰显了中华民族宽仁重义、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秉持宽容豁达之心。”

为了让这一文化传统更加浸润人心，桐城市在公园、广场、景区等公共场所建设六尺巷文化墙 600 余面，开展六尺巷典故系列“微宣讲” 2300 余场次，营造了“人人会讲六尺巷故事、事事懂得礼让道理、处处彰显和谐精神”的浓厚氛围。“文化墙作为一种静态的文化展示载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受到六尺巷传统文化的熏陶。”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讲师王立志介绍说：“‘微宣讲’以互动性和灵活性为特点，深入社区、基层，充分彰显了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柔性塑造力。”通过六尺巷文化的深度熏陶与广泛传播，重塑了基层社会的精神风貌与交往方式，将文化的软约束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硬效能，为构建和谐有序、充满人文关怀的基层治理格局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文化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探索中，桐城市积极推行治理积分制。构建集“分值设置、积分登记、积分应用”于一体的积分管理体系，科学设置“正负面清单”，在村（社区）设立“积分超市”，推出积分在医疗、教育、养老、金融等 7 类 22 项公共服务政策福利，引导群众以善行换积分、以积分“得实惠”、以“和”育美德。将六尺巷传统文化精神纳入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和文明家庭、“好婆媳”以及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巾帼建功标兵等评选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孕育“和”的美德。这一举措把居民参与热情与社区善治目标相统一，发挥六尺巷文化的导向性与凝聚力，重塑基层社会规范与道德共识，促进基层治理形成以文化为魂、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内生秩序与外生规范相融合的良好生态。

群众自治 奏响共治“和谐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重心落于社区，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资源聚焦才能有效回应百姓诉求。

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总有些事儿需要说道说道。六尺巷所蕴含的包容、谦和和精神如涓涓细流，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群众自治方式。在群众自治过程中，桐城市精心搭建群众说事平台，广泛汇集民意，为共治奏响序曲。“由党员干部、‘两代表一委员’、‘五老’人员、村民代表、法律明白人等组成的‘群众说事会’，形式多元，线上便捷高效、线下深入恳切，有效打破了交流壁垒，让各种信息得以顺畅交互。”桐城市嬉子湖镇蟠龙村党总支书记江胜霞介绍说：“无论是地区发展

规划，还是民生琐事，群众的急事立说，能快速得到重视与反馈；缓事常说，始终处于关注视野。”

为了让群众说事更具实效，桐城市构建“说、商、办、评”四步走协商流程，保障各环节有序运作、协同配合。在“说”时，借助线上线下多渠道广泛收集信息，汇聚各方想法；“商”的环节，庭院恳谈会、楼栋议事会上大家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办”的过程中，干部牵头承办、群众携手共办、社会力量辅助帮办，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推动事情进展；“评”这一环节，群众客观评价办理效果，组织严谨评定，保障整个流程与结果真实可靠。为了提升“说”的质效，“群众说事会”凭借“五个清单”，即说事事项、商议情况、承办责任、办理结果、满意评价，对说事流程进行全程把控，让每一项事务都有迹可循、有序推进，做到“村民的事情自己办、众人的事情商量着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关于“群众说事会”在社区中如何彰显效能，桐城市文昌街道西苑社区党总支书记乔丽娟介绍道：“‘群众说事会’为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交流与解决的平台。例如，近期居民养宠不文明现象频现，我们通过‘群众说事会’汇总大家的意见，决定在遛宠高频区域设置‘宠物便箱’，并由党员率先垂范文明养宠；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小区‘小菜园’用粪便施肥、农药包装袋垃圾成堆等问题，支部积极牵头，组织小区党员、居民代表与物业协商，按照‘无主’和‘有主’菜园的不同情况进行妥善整改。”

这种社区基层治理模式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将居民的诉求与多元主体的力量紧密结合。它不仅有效解决了社区内部的具体矛盾和问题，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促进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为构建和谐稳定、富有活力的基层社区治理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桐城市召开“群众说事会” 2480 余场，化解矛盾纠纷 1180 余件，为群众办实事 1500 余件。众多成果使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活环境的优化和便利，归属感与认同感不断增强，推动基层治理良好局面逐步形成并稳固发展。

多元解纷 绘就和谐“同心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内部矛

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桐城市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关于矛盾预防与多元化解的做法，探寻六尺巷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的交触点。

六尺巷所承载的包容、互让精神，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富有文化底蕴的实践路径。桐城市龙腾街道兴元社区党总支书记李高兴介绍说：“在邻里纠纷的处理上，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引导居民秉持相互理解的态度，在矛盾初现端倪时，便通过平和的沟通协商予以化解，而非任由矛盾激化走向诉讼途径。”这正契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的要求。

在多元解纷的探索之路上，桐城市积极整合各方资源，着力打造“一站式”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给群众开辟出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市级中心将群众来访接待中心、诉调对接中心、综治中心等多方面力量汇聚起来，形成功能齐全的服务综合体。住建、教育、农业农村等接待窗口，如一个个便民服务点，耐心接待前来求助的群众；4 个法律工作室和心理疏导室，能为群众提供专业法律意见与心理疏导；进驻的速裁团队和 8 个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全力为群众化解难题。桐城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综治中心咨询室主任李晓庆介绍说：“在这里，群众感受到不用到处跑，就能享受全面服务，达成‘进一扇门、解万般事’的效果。”

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矛盾纠纷分级化解机制，对基层社会治理来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缓冲作用。桐城市黄甲镇水岭村党总支书记章生权介绍说：“在我们村级层面，一般矛盾纠纷由熟悉乡土人情的村干部和调解员处理。这类人员扎根当地，了解邻里乡亲的脾性和村里的习俗惯例，能快速知晓矛盾根源，以拉家常、讲道理的方式，在矛盾刚冒头时就将其化解，防止小事变大。”在镇级层面，遇到重大矛盾纠纷，便整合综治、司法、民政等多部门力量。各部门协同作战，

共享信息，针对问题共同商讨策略，集中力量攻坚克难，使矛盾得到有效控制与解决。县级层面则针对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召集法律专家、行业资深人士等组成的团队来处理。这些专业人员依据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抽丝剥茧般分析问题，为矛盾的妥善解决提供科学方案。如此层层负责、分级化解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矛盾纠纷化解的效率与质量，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基层治理有序推进。

在多元解纷的进程中，挖掘地域特色、乡土资源能被群众广泛接受，桐城市为此培育出多个有影响力的调解品牌。桐城市人民法院孔城人民法庭推行的“六尺巷调解法”，成效很好。桐城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孔城法庭庭长张诚介绍说：“法官运用‘听、辨、劝、借、让、和’六步走法则处理案件。先认真倾听当事人诉求，再仔细分辨是非对错，然后耐心劝导双方，借助古今事例讲清道理，引导彼此谅解让步，直至双方达成和解。”2024 年上半年，孔城法庭结案 320 件，调撤率达 58.44%。大量案件通过这种调解方式得以妥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社会也因此更加稳定有序，有力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

法治保障 守护公平“正义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要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基层党的领导，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带动群众知法、尊法、守法。”基层作为法治建设的重点区域，法治为民众参与基层事务明确了规则，成为民众行为的指引与保障，使民众知法有径、尊法有因、守法有范，促进法律铭刻于心，进而激发他们依法参与社区自治等活动，形成基层法治建设合力，推动基层治理迈向法治新高度，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根基。

六尺巷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谦和礼让、德法合治等理念，在桐城法治保障体系中获得了拓展与升华，催生出“六尺巷工作法”。自 2015 年起，桐城市探索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对六尺巷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思考

中，逐步开启了将文化精神融入法治实践的有益尝试。在不断摸索与总结经验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六尺巷工作法”的雏形，并在西苑社区等多个社区试点与民事调解实践中进行检验与完善。到 2023 年，“六尺巷调解法”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同年 11 月，“‘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入选全国“枫桥式工作法”。这一系列成果彰显了“六尺巷工作法”在法治领域的成效。随着时间进一步推移，这一工作法在制度层面不断细化，在推广范围上持续扩大，从局部区域的试用逐步走向全市范围内的常态化应用，成为桐城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中具有当地特色且行之有效的举措，推动法治与德治协同发力，共同筑牢公平正义的坚实防线，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法治保障的探索中，桐城市人民法院推动“六尺巷法官工作室”入驻同级“一站式”解纷中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推行“简案速裁、繁案精审”的办案模式。“在处理某起邻里纠纷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案时，法官严格遵循民法典中关于侵权责任的条文，迅速厘清责任归属。同时，运用‘六尺巷工作法’，以六尺巷蕴含的谦和礼让理念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在释法明理过程中，法官详细阐释法律条文的内涵与适用情形，让当事人明白自身行为在法律框架内的界定。”桐城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三级高级法官吴问银介绍说：“就这样经过多轮调解，双方依据法律规定和道德指引达成和解协议，案件审理周期较以往大幅缩短，充分体现了法治保障下办案效率与社会效果的统一。”2024 年上半年，该法院速裁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 20 天，体现了办案模式的高效性。

法律援助作为特定群体在困境中的一个出路，桐城市司法局聚焦群众生活中在法律层面的急切需求。“在社区老人遭遇保健品诈骗案件中，我们为老人们详细讲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对诈骗者阐明法律严惩力度，推动双方协商退款方案，守护老人的养老钱；在工伤事故纠纷里，受伤工人因赔偿金额与企业僵持不下，我们依工作法，解释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促使双方合理退让，达成赔偿协议；面对农民工讨薪难题，我们向欠薪企业讲清劳动法规定与违法风险，劝农民工体谅企业资金困境，双方协商薪资支付安排，圆满解决纠纷。”桐城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窗口管理负责人毕大为介绍说，在各类法律事务处理过程中，“六尺巷工作法”成效不断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文化根基。”六尺巷这一传统文化故事所蕴含的谦和礼让美德，犹如源头活水，润泽了当地基层治理的田野。桐城市在传承六尺巷传统法治文化基础上所作出的创新，起到了引导群众崇德向善、遵纪守法，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硬支撑的作用。这启示我们，基层社会治理要开辟新境界、展现新作为，就一定要重视文化根基的深厚影响力，通过文化凝聚人心、汇聚民力，才能激发起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 实践故事

用好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

□ 胡颖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矛盾总是与发展相伴而生。有矛盾不可怕，关键是如何认识、防范和化解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和用好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

用好历史智慧，把握社会大势。“礼之用，和为贵。”先人“和而不同”的理念启示我们在尊重差异中实现共存。历史反复证明，多样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也内含了矛盾。和谐并不意味着同质化，而是在差异中找到共同的基础，实现彼此包容和合作。诸葛亮南征时，为稳定南中地区，并不一味以武力震慑，而是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采取温和的民族政策，通过“七擒孟获”赢得民众认同。这不仅稳固了国家统一，也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

需要日益多样，我们同样需要秉持这种智慧。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对社会长期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表明，妥协和让步并非软弱，恰恰可能是智慧的体现。王安石变法锐意进取，但也遭遇士大夫阶层的反对。为避免尖锐对立，他在改革关键节点上适当让步，调整政策实施的节奏和范围，以更加柔和的方式减少矛盾激化。这不仅延续了改革的生命力，也维护了社会稳定。在利益格局快速调整的今天，改革同样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诉求，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避免矛盾激化。

用好历史智慧，促进社会团结。“上下同欲者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领导者凝聚共识和调动合力，是化解矛盾和推动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汉初年，刘邦深知天下初定、民生困苦，他以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养生息，既缓解了战争频繁积累的社会矛盾，又为汉朝的长治久安和开疆拓土奠定了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团结来自领导者

对民众利益的深刻体察，并通过政策达成共同愿景。

“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领导者以谦和、亲民的态度对待民众及其诉求，有助于赢得社会各方面支持。贞观初年，李世民设立谏官制度，鼓励大臣直言进谏，无论是朝政得失还是民间疾苦，他都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他还把能否善待民众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这些做法不仅赢得了民心，还推动了唐朝社会的繁荣和安定，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尚能如此，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主动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深入调查研究 and 广泛听取民意，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进社会团结。

用好历史智慧，维护社会秩序。“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是柔性的规范手段，强调伦理和情感约束，能够在矛盾激化之前发挥预防作用；“法”是刚性的制度保障，能够在矛盾发生之后维护公平正义。北宋名臣包拯在审理案件时，不仅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还结合

地方风土人情开展调解，从而减少对抗并增进团结。这种礼法结合、刚柔并济的智慧，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高度契合，要求我们在化解矛盾纠纷时既确保程序正义又考虑情感需求，为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则为应对激烈矛盾提供了指引，彰显了中华文明持久而深刻的治理哲学。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冲突时，适当的退让和克制并非懦弱，而是为化解矛盾和实现和解创造条件。当今社会矛盾复杂多样，激烈对抗会加深裂痕。不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执行，权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才能为沟通合作创造空间，从而维护好社会秩序。

用好历史智慧，引导社会行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德服人强调以仁爱、宽容对待矛盾双方，从根本上消解敌意。舜在面对继母和兄弟的恶意时，不对抗相还，而是用德行和宽容感化他

们，用孝道和善良赢得家庭和谐，成就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美誉。舜的智慧告诉我们，解决矛盾和引导行为不能单靠外部的强制力量，而要注重内心和解和道德感化。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人心齐，泰山移。”有了明确的共同目标，能够显著改善群体行为，推动社会发展。历史上，抗倭名将戚继光凭借这一思想成功激发了士兵的团队精神。他在组建军队时，以共同的信念和目标凝聚人心，改变了士兵之间的散漫状态，使他们在战斗中能够协同作战、所向披靡。在当今社会，我们同样需要建立共识和连接情感，更好地引导社会心态和行为。不论是保护生态环境还是应对突发事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明确共同目标，引导好社会心态和行为。

言之成理